

论埃及君主立宪制时期统治精英内部 互动及其影响

孙慧敏* 黄民兴**

内容提要 本文以埃及君主立宪制时期的统治精英为研究对象,从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这一角度解读埃及现代政治体制发展与变化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统治精英主要有以高级专员为首的英国殖民代表,以国王为首的王室家族和以政党领袖为首的现代政党领导成员。在统治精英互动关系中,殖民精英一直占据上风,王室统治精英与政党领导精英基本处于敌对状态。王室精英与以华夫脱党为首的政党精英对权力的争夺是这一时期统治精英互动关系的主旋律。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日后埃及政治体制既不是王权统治,也不是议会统治的新局面。

关键词 统治精英 互动关系

一直以来,对民众历史的研究,都侧重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究其发展的根源、脉络及规律,这是历史研究的主旋律。人民创造历史,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历史的创造,而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个体,往往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具体到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政治精英同样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使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领袖和少数精英人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① 总之,少数当权者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

* 孙慧敏,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① [美]约翰·O. 麦金尼斯文:《个体主义与世界秩序》,《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7期。

息息相关。^① 由此，对精英的研究也是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精英理论虽然遭受到许多非议，但因其理论基础是直接建立在高度差异化的社会事实之上，所以该理论依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② 本文以埃及君主立宪制时期的统治精英为个案，通过对统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尝试解读埃及现代政治体制发展与变化的原因。

一 精英与埃及统治精英

“精英”（法语 élite）一词，最初在 17 世纪用以形容质量精良的商品，后来才用以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如精锐部队和上层贵族。“精英”（elite）一词在英语中的出现始于 1823 年，当时该词已被用来表示社会集团。^③ 在汉语中，“精英”意为精华或出类拔萃的人。在阿拉伯语中，“精英”（النخبة）是动词“挑选”（نَحَبَ）的普通词根型名词，意为挑选出来的精华、精粹、精选之物。

在 19 世纪后期的欧洲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精英”一词被广泛应用于与社会、政治有关的著作中，精英理论由此产生。精英理论是通过对社会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研究，说明社会的性质和统治关系的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精英理论由最初的“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流动理论”，发展到“权力精英理论”和“精英民主理论”。精英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精英理论家对精英的界定也在不断修正与完善。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认为除了短期中断，人类社会一直处在精英的统治之下；精英特指那些最强大、最有活力及最有能力的人。加塔诺·莫斯卡则更为直接，他将精英直白地界定为“统治阶级”，并指出在现实社会中，服从单一指令的、有组织的少数人支配无组织的大多数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哈罗德·D. 拉斯维尔以价值为尺度，认为精英是取得价值最多的人，可望取得的价值有尊重、收入、安全等。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精英是在竞选中获得更多民众支持的个人或者团体。中国学者刘哲昕结合国外学者与人类历史发展经验，将精英界定为人民培养出来的最有能力和最

①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人民出版社，2005，第 599 页。

② 参见刘哲昕《精英与平民》，法律出版社，2014，第 174 页。

③ [英] 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 1 页。

具情怀的优秀儿女,他们既是最有能力、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又是最有道德、最热爱人民和最甘于奉献的。^①

精英理论缘起于西方,最早被用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物与历史事件。阿拉伯学者借助西方的理论,结合本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将精英分为经济、政治、技术、法律等类别,并侧重对政治精英或统治精英进行研究。对政治精英的界定,主要强调精英在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及其在社会地位、社会影响等方面的表现。

哈桑尼·陶菲格·易卜拉欣教授将政治精英界定为社会中的少数人,他们富有才能、潜力与优点等客观条件,并有能力制定政治决策以领导与影响社会的发展。^②艾哈迈德·扎耶德教授认为政治精英是在国家决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群体,政治精英中最为突出的小群体称之为“核心精英”,即国家立法、执法、司法部门的领导人物。^③有学者更为直接地将现代政治精英定位于政党领袖、国会议员、政府首脑与各部大臣等具体职位的人员。^④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对“政治精英”这一概念普适性的疑问。纳比尔·阿卜杜·法塔赫指出埃及不适用这一概念,而更适用“类政治精英”,他们以压迫性的文化、暴戾的话语进行威权统治,对民生疾苦充耳不闻,致使民怨沸腾。^⑤还有学者强调军队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如埃及有军队做后盾,政府官员对国家是单纯地进行统治,而不是治理,即使埃及的政治系统越来越开放,但实际上只是“军事—政治精英”完善和加强政治统治的表象。^⑥

相较“政治精英”,“统治精英”的概念更适用于形容埃及君主立宪制时期政治权力的把持者。这一时期,现代政治体系初步建立,但埃及仍处

① 参见刘哲昕《精英与平民》,第182~183页。

② 哈桑尼·陶菲格·易卜拉欣:《政治精英的危机与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民主期刊》2014年第52期,开罗:金字塔报业集团,阿文版,第25~31页。

③ 艾哈迈德·扎耶德:《后殖民精英》,《民主期刊》2014年第57期,开罗:金字塔报业集团,阿文版,第36~43页。

④ 艾米娜·阿列克:《精英个体与群体:概念、地位与问题》,《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2017年第28期,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大学,阿文版,第171~186页。

⑤ 纳比尔·阿卜杜·法塔赫:《精英与革命》,开罗:艾因出版社,阿文版,2013,第358页。

⑥ Steven A. Cook, *Ruling but Not Governing*,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 26.

于殖民统治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力之下，各政党及政治领袖前途未卜。虽然埃及颁布了宪法，但与现代欧洲议会民主制或君主立宪制相比，国王被赋予过大的权力，得以破坏宪法实施与议会程序；英国军队和顾问继续留驻埃及，从而干预埃及内政。^① 参考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以“统治精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将埃及的统治精英界定为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起决策性作用的人。

二 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统治精英的构成

1805年7月，在马穆鲁克与土耳其人的权力角逐中，阿尔巴尼亚军团青年军官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尼罗河谷的新主人”。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实行家族统治，国家重要的军事或行政职务都由其家族成员担任。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1878年“欧洲内阁”的建立。1923年4月19日，国王颁布了埃及新宪法，改行现代政治体制。宪法规定埃及是君主立宪制的自由独立国家，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分享，外国既得利益不受宪法影响。由此，埃及君主立宪制时期的统治精英由以高级专员为首的英国殖民代表，以国王为首的王室成员和以政党领袖为首的现代政党领导成员构成。

1922年2月28日，英国宣布终止保护国制度，承认埃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同时提出“四项保留条件”^②。英国继续控制着埃及的交通、经济、国防、外交。“四项保留条件”并未受到1923年宪法的影响。交通上，苏伊士运河为英国所控制。经济上，埃及是英国棉花需求的主要供给国。国防上，英国在埃及驻有强有力的军队。外交上，埃及须与英国保持一致。

埃及的半殖民地地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英国驻埃及的高级专员是英国殖民利益集团在埃及的代言人，并具有直接干预埃及内政与外交的职权与能力。即使在1936年《英埃同盟合约》后，高级专员改称为驻埃

^① 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254~255页。

^② “四项保留条件”：第一，保留英国对埃及交通线的防守；第二，借口“保卫埃及领土免受外国侵略和干预”，保留英国对埃及国防的监督权；第三，英国有权保护在埃及的外国人利益和少数民族利益；第四，保留英埃对苏丹的共管权利。

及大使,外交依然唯英国马首是瞻,埃及的内政仍受到英国的限制。^① 二战爆发后,埃及立即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接管了德国财产,并监禁了境内的所有德国人。^② 1942年“二月事件”中,英国对法鲁克国王下达最后通牒,用坦克和大炮部队包围了阿布丁宫,迫使国王立即接受纳哈斯组织华夫脱党政府。

1922年3月15日,福阿德苏丹利用埃及独立的时机,改称为国王福阿德一世,法鲁克王子被英国承认为王储,以排除土耳其贵族统治精英,加强与巩固其家族的统治。1923年宪法赋予国王的权力与王室家族的世袭地产足以奠定其统治精英的地位。这一时期,国王拥有自上而下的统治权。依据宪法,立法权由国王和参议院、众议院共享(第24条)^③,法律必须由国王和议会同时批准才能生效(第25条)。国王以三种方式参与立法:提案权、表决权 and 颁布权(第28、34条)。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第73条),国王有权委任参议院议长和2/5的参议员(第74条),以及解散众议院(第38条)。行政权归国王所有(第29条)。宪法赋予国王直接和间接的统治权,直接权力包括对各部大臣、高级神职人员、军队与王室随护人员的任免权,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以及军官的任免权;间接权力包括分配公共利益,建立或重组政府部门,确定各部职权,以及颁布必要的法律与条例。^④

国王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力恣意妄为,王室精英伺机谋取政治与经济利益。国王甚至公然破坏宪法,进行了三次反议会政变,从而引起了埃及政党的三次护宪运动。19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棉花价格急剧下降,农村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国王听之任之。至君主立宪制后期,法鲁克国王成为埃及最大的地主,拥有耕地28109费丹^⑤,王室拥有全国可耕地面积的1/10,而农村近1/5的家庭没有耕地。^⑥

① 参见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262~263页。

②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20页。

③ 参照宪法原文文本。转引自穆罕默德·哈麦德《埃及宪法故事》,开罗:玫瑰岛印书馆,阿文版,2011,第157~180页。

④ 参见阿里·丁·希拉尔《埃及政治体制的发展(1805-2005)》,开罗:开罗大学政治研究中心,阿文版,2006,第83~87页。

⑤ 埃及土地面积单位,1费丹约合6.3亩。

⑥ 参见〔美〕詹森·汤普森《埃及史》,郭子林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278~279页。

1923年宪法规定，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第23条）。议会拥有立法权，其实施的方式有提案权和表决权（第25、28条）。国王虽有任命各部大臣的权力，但大臣对议会负责（第61条）。众议院可通过对大臣的不信任案，一旦通过，大臣必须辞职（第65条）。另外，每位议员都有对大臣的质询权（第107条）。虽然议会的权力受到国王的压制，但政体基本维持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埃及现代政党开始合法参与国家统治与管理。

1923年宪法是1919年革命的产物。革命之前，埃及相继成立了多个政党，其中祖国党、乌玛党、立宪改革党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政党通过议会选举组建内阁。政党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角逐国家的统治权力，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①现代政党领袖是埃及统治精英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华夫脱党是埃及最有影响力的政党，在阿拉伯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在殖民时代组建的政党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共举行八次议会选举，华夫脱党胜选六次。^②一方面，诸多政党积极倡导的议会政党政治，推动了埃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政党是建立在地主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之上的，其领导精英多出身大地主家庭，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数次执政的华夫脱党，从未主张过土地改革。柴鲁尔在世时，曾提出每人限地50费丹，但遭到党内上层的反对。^③

三 埃及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

通过国家建构，埃及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三权分立制度，并由此构筑了埃及各种政治力量交往与角逐的空间和舞台。^④统治精英之间的合作、疏离与对立几乎贯穿了整个埃及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在埃及1923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统治精英内部的矛盾就初现端倪。英国人要求保证自己的利

① 参见哈全安《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南开学报》2007年第4期。

② P. J. 瓦提克迪：《埃及现代史：从穆罕默德·阿里到穆巴拉克》，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阿文版，1991，第295页。

③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102~103页。

④ 王泰：《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第78页。

益,王室成员竭力攫取权力,而支持君主立宪制的官员又想剥夺宫廷的大权。^①

君主立宪制时期,英国殖民精英的统治政策是同时制衡王室与政党,维护英国在埃及的利益。在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中,殖民精英一直占据上风,王室统治精英与政党领导精英基本处于敌对状态。王室精英与以华夫脱党为首的政党精英对权力的争夺是这一时期统治精英互动关系的主旋律。

以 1936 年《英埃同盟条约》签订为界,这种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中,埃及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王室精英依附殖民精英,排斥政党精英;政党精英利用民众,反抗殖民精英,与王室展开争斗。英国殖民精英忌惮柴鲁尔政府的反英政策,及其倡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英运动。“李·斯塔克事件”发生后,英国殖民精英出面干预埃及内政,发出最后通牒。柴鲁尔拒绝接受,被迫辞职。之后,亲国王的新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了英国的无理要求。华夫脱党重返统治地位一事,屡次因其未能与英国就内政外交事务达成一致而搁浅。福阿德国王借势针对主张限制君权的议会政党实施了三次反议会政变。他支持王室亲信成立政党,如联盟党、人民党,组建“宫廷内阁”,组成数届亲王室的新政府。英国殖民精英对王室权力的增长也有所顾忌,劝诫国王取消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政策,恢复宪法,支持组建两党或多党内阁。

针对英国的殖民特权,华夫脱党领袖柴鲁尔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华夫脱党积极倡导埃及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联合,主张通过合法的与非暴力的斗争方式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②埃及各界群众纷纷集会,要求彻底结束英国的占领制度。^③同时,针对国王的倒行逆施,华夫脱党与立宪自由党组成联盟,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持续护宪运动。19 世纪 30 年代初,人民激烈的反“宫廷政府”活动遍及全国。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宫廷政府”几经更迭,埃及政治面临严峻的动荡局面。

1930~1935 年,华夫脱党被排斥出统治地位。失去政权的这五年间,华夫脱党领导层为重返政坛,甚至一度寄希望于英国向国王施加压力。而

①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 68 页。

② 参见哈全安《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南开学报》2007 年第 4 期。

③ 参见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 256 页。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迫使英国急切希望与合法的民选政府进行谈判，建立同盟，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战争风险。同时，国王委任的“宫廷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国内安全问题和埃英关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帮助华夫脱党恢复了宪法，签订了《英埃同盟条约》，埃及统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阶段中，埃及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殖民精英偏向政党精英，制约王室精英；王室精英利用民众，与主要政党精英进行博弈，以争取殖民精英支持。殖民精英转而支持政党精英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1) 在同盟条约的签订中，华夫脱党政党精英的妥协性暴露无遗，可为英国所用。英军仍获准驻留埃及国土，埃及军队无权进入运河区，埃及的外交自主权仍受到限制。^① (2) 新继位的法鲁克国王年少，英国驻埃及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甚至把 20 多岁的法鲁克依然称为“男孩”。^② (3) 通过合法选举执政的政党精英，可以实现埃及稳定，有利于维护英埃同盟关系。如果不是华夫脱党执政，埃及就不会有稳定的政局，即使同盟条约签订，也难保英国在埃及的地位。^③ 英国殖民精英在“阿布丁宫事件”中对国王下达最后通牒，要求组织以纳哈斯为首政府，这充分说明了英国殖民精英对华夫脱党的倚重。

法鲁克与政党精英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合作与敌对。国王把华夫脱党视作主要的竞争对手，因而拉拢与该党政见不合的自由立宪党，及从华夫脱党脱离的萨亚德党，共同对抗华夫脱党纳哈斯的势力。1936 年《英埃同盟条约》签订时，法鲁克尚未成年，没有摄政权。他亲政之后，便以此诟病华夫脱党。法鲁克注重从群众中获得声望，组织工人与学生运动，一方面是为了与华夫脱党进行对抗，另一方面是为了争取英国殖民精英的支持。1937 年王室精英设法挑起了两次学生与群众的反华夫脱党集会，与会者呼喊“亲国王、反华夫脱党”的口号。^④ 法鲁克深知英国对其王位的影响力，并不想与英国为敌，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殖民精英的关系，唯恐废黜事件在自己身上重演，而英国意在支持有民众基础的政府，法鲁克此举正是投其

① 参见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 263 页。

② 参见〔美〕詹森·汤普森《埃及史》，郭子林译，第 284 页。

③ 参见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 261 页。

④ 参见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 265 页。

所好。

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统治精英内部的互动关系同样值得关注。殖民精英与王室精英内部因其利益较统一，互动关系平和。而作为第一大党的华夫脱党，其领导精英的内部矛盾重重，呈现严重的分裂。1937 年纳哈斯将马哈茂德·努克拉什和艾哈迈德·马赫尔驱逐出党，两人随即成立萨亚德党；1942 年纳哈斯又将克拉姆·奥贝伊德驱逐出党，后者随后建立了集团党。这些分裂出来的党派，都成为华夫脱党的反对党，也成为国王与华夫脱党争夺权力的工具。

四 统治精英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通过现代政治体制确立的权力归属，埃及统治精英借助不同力量围绕权力进行博弈。统治精英激烈的角逐过程构筑了统治精英内部不稳定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成为国家政治矛盾的重点之一，它不仅作用于统治精英本身，同样影响国家的命运和平民生活。

埃及统治精英间的互动关系对埃及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埃及人民谋取了一定的福利。为民谋利是统治精英维持政治权力的保障。英国殖民精英极力想扶持对英友好并有群众支持的政治力量组建政府。^① 统治精英也将人民的支持作为权力斗争的筹码。为了树立民望，统治精英在教育、农业等方面都有所作为，使人民或多或少有所受益。

教育方面，柴鲁尔担任首相后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华夫脱政府制定的教育发展计划有效地降低了埃及的文盲率，后者从 1917 年的 91.2% 下降到 1927 年的 85.9%、1947 年的 77.2%（见表 1）。在教育发展计划的影响下，埃及世俗性的公立中高等教育也取得了重要发展，君主立宪制时期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校人数各增长了近 10 倍（见表 2）。这些新增的学生多数不是来自城市的上流社会家庭或中产地主家庭，而是

^① 阿里·丁·希拉尔：《埃及政治体制的发展（1805-2005）》，开罗：开罗大学政治研究中心，阿文版，2006，第 115 页。

来自农村贫困家庭。^①

表 1 1907 ~ 1947 年埃及的文盲率 (%)

年份	文盲率
1907	92.7
1917	91.2
1927	85.9
1937	85.2
1947	77.2

资料来源：Donald C. Mead,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Egyptian Economy*, (Homewood, 111. : Richard D. Irwin, Inc., 1967), Statistical Appendix 301, Table 11 - A - 6. 转引自 Mahmud A. Faks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Modern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Egypt*, London: Frank Cass, 1980, pp. 42 - 55。

表 2 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人)

学年	中学生在校人数	大学生在校人数
1925/1926	16879	3368
1930/1931	38809	4247
1935/1936	45203	7515
1940/1941	58867	8517
1945/1946	75096	13927
1950/1951	152552	31774

注：不包括爱兹哈尔大学和私立学校。

资料来源：Haggai Erlich,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in 20th Century Egyptian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5, p. 96。

埃及是农业国家。截至 1939 年，埃及有 71% 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69%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② 埃及王室精英和政党领导精英多是大土地所有者。发展农业生产，对于统治精英而言尤为重要。在英国殖民当局派出的农业专家的帮助下，政府积极引导农业生产，推广人造肥料的使用，增

① Haggai Erlich,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in 20th Century Egyptian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5, p. 96.

② Alan Richard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Rural Social Classes in Egypt (1920 - 1939)*, London: Frank Cass, 1980, pp. 56 - 84.

加公共水渠。埃及农村公共灌溉水渠免收使用费, 1923 ~ 1939 年公共水渠长度从 6756 千米增加至 10246 千米。^① 这一时期, 在英国专家的指导下, 埃及农业种植技术得到提高: 提早棉花种植时间, 有效降低了棉铃虫对棉花的危害; 缩小棉花种植间距, 提高了棉花产量。

同时, 埃及工人队伍发展壮大, 成为统治精英各方极力争取的对象。埃及政府通过了一些保护工人的法令, 如实行 9 个小时工作制, 禁用 9 岁以下的童工等。

第二,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利益。随着埃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华夫脱党反对“四项保留条件”, 却亲力促成了《英埃同盟条约》。英国对华夫脱党的态度也由反对转为支持。在统治精英互动关系的变化中, 英国对埃及的控制相对减弱, 埃及的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维护。

外交上, 埃及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1937 年 5 月, 埃及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加入国际联盟, 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内政上, “四项保留条件”的第三条, 即保护外国人和埃及少数民族的权利, 由英国人手中转移到埃及政府手中, 从而维护了埃及对内行政权的基本完整。经济上, 废除了外国人享有的包括免税在内的各种特权。条约签订后, 苏伊士运河的租借费得到提高。军事上, 埃及开始扩大军队规模, 军人可以从中产阶级家庭招募, 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上层。

第三, 确定了埃及实施世俗统治的政治体制。君主立宪制时期, 埃及政治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沿着现代发达国家的轨道进行的。^② 世俗的统治精英没有给宗教精英留下攫取国家权力的空间。政府机构设有宗教基金部, 管理日常的宗教事务。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归国王所有。此外, 统治精英在权力的争夺过程中, 注重借助世俗的力量, 而非宗教力量。埃及的宗教势力被统治精英有意地排除在统治力量之外, 沦为统治精英的附庸。甚至

^① Alan Richard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Rural Social Classes in Egypt (1920 - 1939)*, pp. 56 - 84.

^② Bent Hans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in Egypt and Turk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2.

有议员提出废除宗教法庭，取消穆夫提这一宗教职务。^①

在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中，科普特人的政治参与也限制了宗教势力向统治精英的渗透。华夫脱党自成立之初就注重党内的科普特人比例，以增强自身代表的广泛性。1923年，埃及政府正式废除米勒特制度，这大大激发了科普特人的权利意识。君主立宪制时期，科普特人广泛参与了埃及国家的政治生活。1927年柴鲁尔去世后，科普特人马克拉姆·埃贝德一度成为华夫脱党的领袖，后来多次出任政府大臣。^②

第四，促进了自由、平等与民主思想的传播。1923年宪法明确规定了人人平等。统治精英在政权的博弈中，政党精英利用报纸等手段，宣传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主张。华夫脱党与自由立宪党组织群众进行三次护宪运动，多次重申宪法精神，使平等与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精神从观念和实践上得到传播。

埃及统治精英间互动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埃及仍然没有摆脱殖民地的地位。殖民精英一直处于统治精英互动关系的顶端。一向反对殖民统治的政党精英，也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同盟条约签订后，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占领由非法变为合法。殖民精英控制着埃及的一切，在埃及建立了为殖民服务的功能型国家，为埃及构建了虚伪的国家身份，将殖民国家的矛盾转移到埃及这片文明的国土之上，挑起埃及国内政治力量的斗争，使之角逐殖民者伪造的国家权威，将埃及各种政治势力玩弄于股掌之间。^③ 二战期间，殖民精英扶持华夫脱党掌权，要求政府遵守同盟条约。根据《英埃同盟条约》，战争期间埃及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财尽民穷。^④

第二，激进组织兴起与壮大。在精英的互动关系中，法鲁克利用民众暂时掌握主动权之后，也像他父亲福阿德国王一样，践踏宪法的尊严。华夫脱党虽然具有明显的非民主倾向和贵族政治的浓厚色彩，但只要该党坚

① 马塞尔·库伦卜：《埃及的发展（1924—1950）》，祖黑尔·沙溢布译，开罗：马德布里出版社，阿文版，1998，第160页。

② 参见李福泉《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

③ 艾哈迈德·阿卜杜·法塔赫（أحمد عبد الفتاح）：《埃及殖民化：作为功能团体的埃及统治精英》，参见阿文网站：<http://rouyatourkiyyah.com/> / استعمار مصر - النخب - الحاكم في مصر - كجماع (2017.10.20)。

④ 吴宝国：《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埃及》，重庆出版社，2004，第54页。

持反对国王支持的、英国做后盾的政府，就保持着国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大战斗形象。^①而在同盟条约签订后，华夫脱党已经失去了民心。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和立宪民主制的政党，为了上台执政，竟甘愿接受外国的刺刀保护，这无异于政治自杀。^②

统治精英之间的争夺，导致议会体制内的统治危机，引发人民失去对埃及走君主立宪制道路的信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正是在统治精英醉心权力、枉顾民心的危机情形下，从一个纯宗教组织演变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宗教政治组织。1932~1948年，穆斯林兄弟会分支机构由50个发展为2000个；1936~1948年，其成员由800人增至50万人。^③穆兄会成为日后政府最主要的反对派，埃及政局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第三，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王室精英与政党精英的殊死斗争，加之殖民精英的干涉，引起埃及政局的动荡。为期28年半的君主立宪制时期，历经38任政府。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9个月。1952年上半年，历经4届政府，其中阿里·迈赫尔组建的政府，任期只有33天。议会屡遭国王解散，只有一届议会完成了既定的任期。精英领导的抵抗运动从合法抗议演变为违宪行动，暴力、暗杀也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④

人民群众成为统治精英利用的工具，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安定。法鲁克国王极尽展示其亲民性，以赢取人民的支持。埃及青年协会是国王主要的支持者，他们组织大城市的学生和社团，成立半军事性的“绿衫队”。华夫脱党倡导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也是利用民众的支持加强自身的力量。^⑤为了同国王及其他政党角逐权力，华夫脱党还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青年联盟”，成立半军事性的“蓝衫队”，以动员党的追随者和民众，并对反对派实施恫吓和恐怖。^⑥统治精英无止境的争斗，引起了社会的激烈动荡。1952年殖民精英挑起的“火烧开罗城事件”，王室难辞其咎，群众伺机发泄不满，激进分子更是火上浇油。自此，任何政党精英组成的政府都已无力

① Haggai Erlich,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in 20th Century Egyptian Politics*, p. 100.

② 参见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第271页。

③ 参见哈全安《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76页。

④ 阿里·丁·希拉尔：《埃及政治体制的发展（1805-2005）》，第106页。

⑤ 哈全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

⑥ 参见雷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264页。

回天，埃及社会与政治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

结 论

君主立宪制前期，人民的权利与民主意识薄弱，埃及的国家政治生活基本局限于社会上层的统治精英。新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被重新分配。统治精英围绕新释放的权力展开殊死搏斗，人民不过是统治精英争权夺利的工具。所以，这一时期统治精英的互动很不稳定。精英互动关系中的起伏引起了社会与政治的动荡，最终导致埃及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但在统治精英的较量中，人民的民族、民主与权利意识被唤醒，他们既反对君主的专制统治，又反感政党的议会统治。随着自由军官组织、穆兄会的崛起和 1952 年革命的爆发，埃及进入了一个没有国王、没有议会，乃至长时期没有政党的新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李福泉]